

● “一带一路” 教育研究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中亚五国 教育交流合作30年审思

肖甦, 时月芹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中亚五国是我国西部的重要邻国, 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支点。加强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增进我国与中亚国家政治互信、提升经济合作水平、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机制。双方 30 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走过从缓慢到迅速、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进程。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 我国与中亚五国之间教育交流合作的路径不断丰富, 成效显著。但由于中亚地区复杂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和多变的地缘政治环境, 双方交流与合作的可持续性和务实性发展尚面临缺乏中长期战略规划、中国教育品牌意识不强、复合型人才培养不足等诸多挑战。我们应具有高阶思维, 注重对接中亚各国发展战略, 致力于区域教育一体化的协同推进, 着力打造区域教育高地, 创新语言文化的传播策略, 从而实现中国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合作的高质量发展与共赢。

[关键词] 中亚五国; 教育交流与合作;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G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667 (2022) 12-0003-13

DOI: 10.20013/j.cnki.ICE. 2022.12.01

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地处欧亚大陆腹地, 是我国西部边陲重要邻国, 在边境安全、能源贸易、物流运输、民间往来等方面于我国有着特殊重要意义。特别是自 2013 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 中亚五国因其在复兴古代东西方洲际贸易通道上的独特枢纽和要冲地位, 于我国的战略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同时, 中亚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宗教和多元文化的聚集之地, 也是俄罗斯、欧盟、美国、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日本、印度、韩国等国际行为体的利益争夺高地, 是全球合作机制最

复杂的地区之一。2022 年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建交 30 周年, 而教育交流合作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人才和智力支撑机制, 而且也是增进我国与中亚五国民心相通的重要基石, 对于弥合双方间的文化差异、增进文化理解与文化认同、增强国际合作实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尝试对 30 年来中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作进行全面立体的审视与思考, 力求为促进与中亚国家教育交流合作领域的提质增效、助力我国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行稳致远、合作共赢提供参考。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划 2019 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提升国家竞争力框架下中国、俄罗斯教育现代化战略比较研究”(项目编号: BFA190066)。

作者简介: 肖甦, 女,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时月芹, 女,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一、我国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合作的基本样态

中亚五国原属苏联加盟共和国，于1991年相继宣布独立。我国与中亚五国有着悠久的文明交流史，但双方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合作始于苏联解体、五国独立之后。30年间，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作逐步推进，时代特点鲜明，成效日渐凸显。

（一）作为交流与合作客体的中亚五国教育发展概观

苏联时期统一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以及对中亚地区的教育扶持为日后成为独立国家的中亚五国其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早在苏联解体前，这5个当时的加盟共和国就已全部建立了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在校大学生在每万人口中的比例不仅超过发展中国家，而且超过了意大利、英国等许多西方发达国家。^[1]独立之后，中亚五国均开始实行以总统制、多党制、三权分立和普选制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式民主政体，经济上也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

转型初期，中亚五国国内政治经济动荡，经费拮据，大量高级人才外流，教育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中亚五国教育领域的变革集中表现在增强国家民族认同、民主化、国际化、市场化四大方面。教育基本原则强调国家民族认同的建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更强调对人的个性、权利和自由的尊重；教育系统更具开放性，积极融入世界教育空间；注重发展教育领域的国家-社会伙伴关系，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获得长足发展。但由于威权主义传统的影响，除吉尔吉斯斯坦外，其余四国的教育管理体制仍呈现较明显的中央集权特征。

独立后的中亚五国都将教育置于国家优先战略高位，注重对教育的投入。2017年，吉尔吉斯斯坦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2]，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用于教育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以上。^[3]中亚五国国民基本教育素质普遍较高，识字率高达99%以上，远超埃及和黎巴嫩这两个阿拉伯世界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中亚五国教育系统虽然具有同源性，但教

育领域的改革各具特色，教育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目前，中亚五国的教育体系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问题：教育管理效率低，教育质量不高，人才外流；^{[4][5]}职业技能培训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人才培养结构性失衡；^{[6][7]}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平衡等。^[8]

（二）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合作承载的三大使命

国家间的教育交流合作历来肩负重要的使命。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作有助于双方增进政治互信，提升经济合作水平，实现民心相通，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1. 夯实高水平政治互信的社会基石

中亚地区是我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重点。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接壤的边境线长达3300公里，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是我国的西部边陲近邻。同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与中亚国家有着共同的安全与发展诉求。但由于历史原因和语言文化的限制，中亚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对我国的外交理念和国际倡议存在误读、猜疑甚至忧惧的情况。而教育交流合作对于增进我国与中亚五国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弥合文化差异、提升我国国际形象、共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基础和推动作用。

2. 拓展深度经济合作的动力支撑

我国与中亚国家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30年来，双方经贸合作获得了快速发展，贸易额由不足5亿美元发展到2021年的500多亿美元，增幅高达100多倍。^[9]随着双方经济合作空间和规模的扩大，专业型和复合型人才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欧美敌对势力大力渲染的“中国威胁论”也让中亚国家对与我国的经贸合作表现出一定的疏离和警惕之心，影响了双方合作的宽度和深度。加强教育交流与合作，一方面能够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急需的人力资源支撑；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维护我国在中亚地区和平、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务实经济合作提供“润滑剂”和“粘合剂”。

3. 搭建实现民心相通的文化桥梁

由于历史上长时间的隔阂，我国与中亚五

国人民缺乏相互了解。中亚人民关于中国的信息很多是来自西方媒体,其中不乏对我国的刻板印象、偏见与敌意。而我国在中亚地区的公共外交基础薄弱,实现“民心相通”是双方“五通”建设中最难的一环。“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教育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促进我国与中亚五国人民对彼此历史和文化的理解与尊重,消弭偏见与敌意,是实现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的桥梁。再者,我国与中亚五国同为发展中国家,有着融入国际教育空间、实现本国教育现代化的共同愿景,而中亚地区青年人口基数较大,双方教育交流与合作空间广阔。

(三)与中亚五国展开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三大时间节点

随着双边外交关系的正式确立和历史遗留边境问题的解决,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作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就其已走过的30年发展进程而言,有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值得明晰。

1.20世纪90年代初以建立法律框架为基础的初步接触

由于中苏两国较长时间的交恶,我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缺乏相互了解,政治经济合作总体上都处低位运行,双方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更可谓零基础起步。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与中亚五国陆续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建构起了基本的教育交流合作法律框架,对双方教育组织、人员与信息交流,文凭、证书、学位和职称相互承认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但这些法律文本还相对粗糙,缺乏可操作性文件的支持。这一时期,我国对中亚五国的教育援助比较零散,中国教育品牌影响力不足,在中亚缺乏存在感。双方间教育合作体量亦很小,多以西部省(区)与中亚各国的零星接触为主,交流路径单一,只是在语言学习方面有少量互派人员。

事实上,彼时的中亚已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教育大市场。在教育领域私有化、市场化与开放化初始并胶着的情形下,中亚五国都面临重塑国民教育体系却经费拮据的现实困境。欧美国家恰是借此开始了对中亚教育空间这块大蛋糕的积极行动。欧盟1990年就已启动旨在按欧洲模式改造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教育

体系的“泛欧大学流动计划”(即“坦普斯计划”,Tempus Programme)。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4国于1994-1997年间先后加入了该计划。截至1999年,仅“坦普斯计划II”框架下,欧盟就已向中亚地区提供了约1770万欧元的财政资助。^[10]美国1992年开始在中亚地区实施培养青年一代民主价值观的“中小学交流计划”(FLEX)。土耳其自1992年起,在土库曼斯坦不同城市创办了20所土耳其实科中学。^[11]

相较之下,我国虽然第一时间承认中亚五国独立并与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囿于当时的国力,我们未能从更高站位充分重视教育合作,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作显得谨慎迟缓,缺乏战略引领和实地推进。这在一定程度上错失了及时进入中亚教育空间的好时机。

2.新世纪开启机制化建设的广泛尝试

进入21世纪,我国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国力逐步增强,经济的溢出效应开始彰显,与中亚五国的交流合作也进入全新阶段。2000年实施的“走出去”和“西部大开发”两大战略使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企业进入中亚投资办厂,开展国际贸易。2001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正式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永久中立国土库曼斯坦未加入)。我国与中亚地区的教育交流由此获得了多边合作平台的支持。

在伙伴关系双边框架和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平台支持下,中亚各国与我国的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我国成为中亚五国重要的经贸伙伴和投资来源国。随着经济与贸易合作规模的扩大,双方对语言和专业类人才的需求急剧上升,中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也迎来机制化建设时期。一方面,双方细化了合作的法律基础,从信息沟通、学历学位证书互认、校际合作、师生国际流动、政府奖学金政策、教育教学国际研讨等方面规范了交流合作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在人才培养机制上,形成了集语言文化教育、语言+专业教育、留学生教育、联合培养等多位一体的基本形态。

2000年以来,我国与中亚五国不同形式的

教育交流合作机制日臻成熟,双边合作的相关法规已跳出“文化”这一大概念,对教育活动的规范更具直接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多边合作平台也为区域人才交流与合作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教育交流合作模式逐步由要素流动型向规则制度型转变,合作的规模与层次亦持续扩展。

3.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的拓展与深化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了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期冀借助“古丝绸之路”这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拓展双方的经贸合作与发展空间。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框架下,我国与中亚五国的高层交往日益频繁,中亚五国也都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热烈欢迎,并积极推进本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双方经贸合作规模与水平进一步提升。随着《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等一系列政府政策文件的颁布,“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我国与中亚国家的教育交流合作进入了实质性落实、规模性推进、质量化提升的发展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与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叠加效应,使我国与中亚五国在教育交流与合作方面实现了更高层次的战略对接和政策落地。地方、教育机构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活力被极大地调动和激发,各方联动合作机制运行通畅,教育机构间的合作项目遍地开花,双方教育合作的政策红利直接影响到教育实体的方方面面。

如果说前一阶段我国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基本层面是法律基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制度化建设的话,那么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之东风,双方从2013年已进入将教育交流合作切实落地并深化发展的阶段。这无疑为双方政治互信、经贸投资的稳定发展和民心相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支撑。

二、“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合作的成效与路径特征

我国与中亚五国30年来的教育交流与合

作之路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中亚五国全面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哈为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地区安全、能源、贸易等领域的合作也日益深化,教育的人才支撑作用更加凸显。在多元主体的推动下,双方教育交流合作成效明显,路径日益多元化。

(一) 语言与文化教育搭建双方沟通的重要桥梁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我国与中亚五国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跨越式的发展提升了双方对语言类人才的需求,形式多样的语言与文化教育成为双方沟通互鉴的重要桥梁。

1. 扩展语言与文化传播的教育平台

我国高校与中亚各国陆续合建的孔子学院是中亚地区传播汉语和文化的主体机构。从2005年至今,中亚地区共建成了13所孔子学院:哈萨克斯坦5所,吉尔吉斯斯坦4所,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各两所。^[12]孔子学院的学生规模也呈现几何式增长。截至2018年,仅哈萨克斯坦的孔子学院就为3500名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提供了汉语知识和能力培训。2018年,共有150余名哈国学生获得孔子学院总部的奖学金资助,赴中国攻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和接受语言培训。^[13]中亚的孔子学院基本已形成辐射各国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等教育层次的体系化汉语与文化教育架构,切实增进了双方民间的理解和友谊。同时,孔子学院还承担着编写本地化汉语教材、组织汉语水平考试、颁发中国政府奖学金和孔子学院奖学金、向我国推荐优秀留学生等功能。但孔子学院是非学历教育机构,其在中亚地区的教育影响力较为有限。^[14]

依托语言文化中心推进双方语言文化教育,也是我国与中亚五国拓展语言文化传播途径的重要举措。2012年12月,我国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图书馆设立了中国文化教育中心。2021年10月,中吉第一个联合人文交流中心——“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人文交流中心”在中央民族大学成立。哈萨克斯坦则在中国设立了6个语言文化中心和经济社会研

究中心。^[15]这些文化教育交流机构已成为双方间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2. 开拓语言文化的学历教育途径

随着我国与中亚五国全方位合作的加深,双方对高水平语言人才的需求日益凸显。汉语和中亚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成为各自高等教育层级的重要任务。

在中亚五国,各国高校设立的汉语或中国学专业(研究中心)是培养汉语语言类高级人才的学历教育平台。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哈萨克斯坦国立师范大学、哈萨克斯坦国际关系与世界语言大学、欧亚大学及一些私立高校都在东方学系下开设了中文专业。^[16]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成立了中国学系,下设汉语语言教研室和中国历史、文化、政治与经济教研室,包含本科和硕士两个培养层次。^[17]近些年来,中亚各国高校也积极依托孔子学院,以“专业+汉语选修课”等形式,探索专业教育与汉语学习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在我国,由于一贯以俄语为主培养面向中亚地区的语言人才,使得精通中亚国情、历史与文化的人才匮乏问题凸显。而独立后的中亚各国为加强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在实行以国语、俄语、英语为主的双语或多语言政策的同时,又都非常强调本民族语言的保护和发展。为能真正实现民心相通、提升交流合作效果,我国不断加强对非通用语言类人才的培养。中央民族大学于 21 世纪初率先在原俄语专业下开设了“俄-哈”“俄-吉”“俄-乌”“俄-土”语本科专业,探索“俄语+中亚语”高端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其后,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等高校都开设了非通用语专业。但由于起步较晚,人才缺口仍很大,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等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二) 以政策倾斜助力留学生教育规模与质量提升

2000 年以来,我国与中亚五国间的人才流动明显增强,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亚国家来华留学不断升温,留学生的规模不

断扩大,层次结构也有明显改观。

首先,我国政府加强了对中亚地区的奖学金政策倾斜。2010-2018 年间面向中亚地区学生发放的教育奖学金超过 5000 份。^[18]加之我国教育质量与口碑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中亚学生选择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国。2012 年,中亚五国来华留学生总数为 16,425 人,2017 年已增至 28,532 人,在我国来华留学生总数中的占比也从 3.97% 提升至 6.07%。^[19]对于哈萨克斯坦学生而言,我国已成为他们继俄罗斯之后的第二大留学目的地国,2015 年来华留学的哈国学生有 13,198 名,占国际生总人数的 3.32%^[20],到 2020 年已达 1.5 万人。^[21]

其次,中亚五国来华留学生的学历结构也呈日益优化趋势。中亚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的占比由 2012 年的 41.9% 增长到了 2017 年的 58.5%。中亚来华留学的学历生以本科生为主,但近年来也呈现出研究生增长率大于本科生的情况。2012-2017 年间,中亚来华留学本科生年均增长率为 20.2%,留学研究生年均增长率则达到 28.9%。^[22]

此外,我国到中亚地区学习的学生也呈增长趋势,但我国赴中亚五国留学的学生规模仍很小,即便在哈萨克斯坦的中国留学生最多,2018 学年初也只有 1290 人,占哈国留学生总数的 9.2%^[23],尚不足哈国在华留学生规模的 1/10。我国赴中亚留学的生源大部分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学习俄语的自费留学生为主,因为中亚学费比俄罗斯便宜近一半。但这种以资金交流为主的人才交流模式,缺乏实质性内容,可持续性不足。^[24]

分析发现,中亚学生来华留学升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一带一路”倡议让中亚五国人民看到了中国愿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诚意;其次是缘于对双方睦邻友好关系可持续发展之信心;第三,我国政府奖学金向中亚地区的倾斜让中亚学生得到了政策红利;第四,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质量以及信息技术、石油天然气、法律等专业在中亚地区的认可度不断提升;最后,相较欧美国家,我国教育服务价格更为优惠。而我国到中亚地区留学的学生体量

较小,除语言、文化因素外,则主要是受制于中亚地区相对落后和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这也意味着我国主动走向中亚,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使者还有较大的培育空间。

(三) 以联合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的规格与类型

随着双方教育交流合作机制的多元化发展,我国与中亚各国的交流也开始突破语言类人才培养及孔子学院式合作模式,校际联合培养模式开始受到重视,院校合作的领域和层次也不断拓展。

1. 高等教育层级的联合培养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与中亚五国的人才联合培养合作开始突破传统的学生互换培养模式,向联合办学模式转变,在各自的优势专业领域加强合作。2016年,湖北工业大学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大学联合创建“湖北工业大学阿拉木图校区”,采取“4+0”的境外联合办学模式培养哈萨克斯坦学生。即学生不用来中国学习,4年全程均在哈萨克斯本校学习,但中哈双方学校共同拟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中方提供师资,进行联合管理,学生毕业可获得两国本科学位。2021年,河南大学与吉尔吉斯斯坦民族大学合作成立了“丝绸之路学院”,采用“汉语+”模式培养既懂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又有技术、懂管理的复合型实用人才。就合作院校的地域分布而言,则呈现已突破西部边境省(区)向中东部和全国辐射的趋势。

但相较俄罗斯、土耳其、美国、韩国等国家和欧盟在中亚地区大力扩展海外分校网络的发展趋势,我国与中亚五国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层次与规模都相对较低,目前中亚地区尚无一所中国高校的海外分校。

2. 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办学

近年来,合作办学成为我国与中亚五国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重要模式。浙江省打造的“一带一路‘丝路学院’”成为学校与企业携手“走出去”、解决企业对海外员工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重要路径。成立于2021年的“乌兹别克斯坦鹏盛丝路学院”,系由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与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园区发展有限公司、塔什干

国立农业大学三方合建,采用的是“中职院校+海外中资企业+海外高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鲁班工坊”是我国知名国际职业教育品牌,采用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2022年8月,中亚第一个“鲁班工坊”落户塔吉克斯坦。该“鲁班工坊”设有工程测量技术、城市热能应用技术两个专业,由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承担师资培训任务。

职业教育领域的这些合作加强了技能型和专业型人才培养力度,刺激了当地的就业,既有助于解决我国企业的海外用工难题,也助推了与中亚高校、企业间的深入合作。并且,双方的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已由初期的技能培训向专业课程和教学标准输出转变,并发展为与对方分享我国职业教育理念和职业文化,成为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国形象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此类职业技术人才的联合培养在规模、层次和质量上都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四) 发挥多边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的优势

我国和中亚五国均主张世界多极化,主张在多边平台框架下加强交流与合作。我国也积极推动教育领域多边平台建设,发挥多边教育交流合作机制的优势,进一步提升与各国交流合作的实效性。

1.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多边教育合作

根据2006年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教育合作协定》(上海合作组织,下文简称“上合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教育合作主要包括促进教育交流和推动教育互认两个层面。官方层面的教育部长会议,以及民间层面的“教育无国界”教育周、大学校长论坛和中国中亚国家大学生交流基地是其重要工作机制。于2007年8月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系由成员国高校构成的非实体合作网络,旨在加强成员国高校间高层次人才的流动性,促进区域教育一体化进程。

迄今,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项目院校已由成立之初的53所增至82所。其中,中方项目院校为20所,中亚地区有33所(哈萨克斯坦14所,吉尔吉斯斯坦9所,塔吉克斯坦10所)。^[25]其人

人才培养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两个层次,涵盖区域学、生态学、能源学、IT技术、纳米技术、教育学和经济学7个优先合作方向。2018-2019学年,共有230多名学生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联合教育课程。^[26]2022年1月,上合组织框架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学院”在青岛揭牌成立。该学院致力于“经贸+”学科体系建设,旨在培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创新型经贸人才,显示出上合组织框架下专业人才培养的机制和领域正进一步拓宽。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上合组织大学已形成相对成熟的组织协调机制。但应该看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利益诉求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成员国对教育类公共产品的兼容性和多元化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扩员后上合组织内部异质性的不断提升,如何在关照各成员国差异化教育合作需求的同时,推进组织内教育空间一体化建设,引导多轨利益走向共识与共赢,是上合组织大学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 国际高校联盟的积极协作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研究中心(基地)在与中亚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彼此之间缺乏交流与合作,限制了智库功能与作用的发挥。^[27]“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国内外高校已共同组建了数十个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高校联盟。既包括综合性高校联盟,如西安交通大学倡议发起的“丝绸之路大学联盟”(2015年)、新疆大学发起的中国-中亚国家大学联盟(2016年),也包括专业性或行业性大学联盟,如陕西师范大学发起的“丝绸之路教师教育联盟”(2017年)、浙江大学发起的“一带一路”工程教育国际联盟(2018年)等。此外,“中国-中亚合作论坛”“中国-中亚国家大学校长论坛”等多边论坛也是我国和中亚五国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这些高校联盟和多边论坛为不同行为主体之间搭建起了资源与信息交流共享平台,有助于提升区域内高校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我国也在逐步推动不同多边合作机制之间的对接与互鉴。近年来,中俄两国政府正积极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对接合

作,两个世界大国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之间的对接,不仅有助于区域内政治经济环境的稳定,降低协调成本,而且也有助于为教育交流与合作带来新机遇。2018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首次将哈萨克斯坦列为特邀伙伴国。这应是“中国-东盟”与“中国+中亚五国”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间对接的一个积极信号。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与合作更为细化、深入,参与主体也日益多元化,逐步形成了“国家战略引领+地方战略对接+教育机构全面参与+社会力量积极行动”为基本格局的多元主体参与结构。但在合作的对等性、发展的务实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尚须进一步增强。并且,相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双方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三、我国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合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纵观我国与中亚五国30年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历程,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了中亚五国的普遍欢迎,双方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也借此取得了诸多进展,但由于复杂的历史、人文环境和区域内外不和谐因素的干扰,可持续性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仍面临诸多问题与阻力。

(一) 中亚地区形势复杂,区域内合作动力不足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能源、贸易潜能,中亚地区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偷运武器、贩卖毒品、阿富汗局势等因素直接威胁着中亚地区的安全,而中亚五国的民族和宗教结构又十分复杂,内部政治势力角斗不断,所以国家和社会稳定易受外部势力的牵引。当前的俄乌战争和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给中亚五国的经济社会稳定与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受此影响,中亚地区未能构建起良好的区域内合作机制,也严重制约了我国与五国间教育交流合作的发展。

虽然中亚是“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承载区,但近年来中

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无论在规模和层次上,还是在合作机制与创新上,都远不及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承载区的东盟国家。官方统计数据表明,2018年中国前10位留学生生源地中,有3个东盟国家,而中亚国家只有居第10位的哈萨克斯坦一个。^[28]从2016年我国在泰国开设首个“鲁班工坊”至今,已在世界各地建成20多个“鲁班工坊”,但直到2022年8月,中亚第一个“鲁班工坊”才落户塔吉克斯坦。

(二) 国际竞争激烈,教育交流与合作面临多维压力

独立后的中亚五国均有强烈的融入国际社会的需要。随着中亚地区的开放和在全球空间内战略地位的提升,该区域日益成为大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地缘政治利益博弈的角斗场。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教育影响力贯穿五国国民教育系统的所有层次,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就建立了17所海外分校^[29],是中亚学生的第一留学目的地,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四国留学生占俄罗斯外国留学生总数的47%。^[30]欧盟一直积极利用其规范性机制影响中亚五国教育体制的转轨转型。美国则发挥其资金和教育品牌优势,着力影响“崛起的中亚新一代”。土耳其、印度、韩国、日本等国也积极在中亚地区展示自己的教育实力。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全球性国际组织也都积极参与和影响中亚地区教育进程。

显然,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不仅面临着与世界主要权力主体之间的“新大博弈”,而且需要承载中亚国家实施“多元平衡外交”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欲持续有效推进,任重而道远。

(三) “中国威胁论”沉渣泛起,教育交流与合作遭遇阻力

近年来,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加强了遏制我国和平崛起的力度,利用其媒体优势污蔑和诋毁我国的和平发展与成就,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我国在中亚地区的国际形象。伴随着我国在国际上政治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加之

苏联时期形成的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中国威胁论”在中亚国家沉渣泛起。长期缺乏对中国的真实了解,使得中亚部分政治精英和民众认同西方媒体蛊惑,对“一带一路”倡议、我国提供的教育援助以及双方教育合作持消极和抵触态度,部分中亚国家也对汉语和我国文化在其国内的传播持谨慎态度。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亚民众对我国教育成就的深入了解,抑制了双方合作的热情。

(四) 中国教育品牌意识较弱,教育品牌国际辐射力不强

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发展成就对同属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亚各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由于长期处于追赶型发展模式下,我国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本国教育品牌的塑造和宣传,影响了中国教育品牌的国际认可度和辐射力。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作以非学历教育为主,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明显欠缺,教育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十分有限。^[31]同时,我国在中亚地区缺乏有特色和知名度的教育合作项目,很多双边教育项目具有临时性、零散性的特点,可持续性和系统性不足。虽然我国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区域多边合作平台的发展,但教育并不是上合组织的关注重点,且成员国不包括土库曼斯坦。反观欧盟,在中亚五国独立之初即积极利用其自身优势影响中亚教育系统的改革,所推出的“坦普斯计划”仅2007-2012年间就已吸纳中亚地区约150所高校,教育援助金额也从500万欧元增加到了1500万欧元。^[32]博洛尼亚进程也是中亚五国教育改革的参照系。2010年,哈萨克斯坦已正式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中亚其他国家虽未正式加入其中,但在某些环节上已借鉴该模式进行教育改革,如实行本-硕-博三级教育体制,推行学分制等。

此外,我国的教育与文化理念具有独特的东方特色,与欧美的文化价值观有较大差异。在欧美文化价值观强势围攻下,中国教育品牌尚需一个凝练、提升及被合作伙伴了解和认同的过程。这也是目前中亚学生更倾向于和具有共同历史及文化渊源的俄罗斯教育和国际市场占有率最高的欧美教育的原因之一。

（五）缺乏中长期战略规划，交流合作的规模与质量有待提升

我国与中亚国家虽然建立了高层定期交流机制，但具体到教育领域，仍缺乏部门间有效的高层定期会晤机制，教育仍被视作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未作为一个单独的、有着特殊重要意义的领域被重视。同时，我国也未制定明确有效的和中亚开展长期教育合作的战略性规划，缺乏清晰的定位和具体操作思路。

因此，借力“一带一路”倡议下出台的一系列支持性政策，我国赴中亚寻求交流合作机会的地方和高校呈现出“季候性”的特点，更多是为了消化国内的优惠政策，缺乏成熟的合作设计和实质性合作内容，规模与质量均有待提升。与我国和中亚高层交往的热度和投资贸易规模屡创新高的局面相比，在民心相通层面，我国国家形象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则大打折扣，甚至出现了排斥现象，这与双方在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战略规划落后于政治和经济层面有很大关系。

（六）人才培养模式单一，高层次复合型专业人才短缺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我国与中亚五国的经贸与产能合作迅猛发展，引发了对国际化人才的刚需。但反观双方间的教育交流合作，则在模式、规模、层次等方面都存在问题。

首先，双方交流合作基本以传统的语言文化教育、留学生教育和联合培养为主，体量较小，合作的层次也偏低，缺乏体现中国现代化教育品牌特色的合作机制（如开办我国高校的中亚分校），中国教育在中亚的整体存在度不高。

其次，我国在境外的语言文化推广主要倚重于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体系，汉语教学在对方国家教育体系中所占份额很小。同时，汉语教师，特别是“汉语+专业”复合型教师的严重不足也限制了汉语与文化在中亚地区的传播。而国内面向中亚的外语人才培养仍主要依赖俄语人才的培养，针对中亚各国国语及其国情的教育教学远远不足。

此外，我国与中亚的国际人才培养还存在重语言、轻专业教育的问题。既懂外语又懂国际

贸易、管理和专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制约了交流合作的深化发展。人才培养层次结构也存在非学历生比例较重、高层次学历教育人才相对较少的问题。

四、我国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方略与路向

2022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发表了《撒马尔罕宣言》，强调在快速发展和大变革的新时期，国际挑战和威胁不断加剧，国际形势逐步恶化，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均在增加。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美利用俄罗斯的无暇他顾，加大了对中亚地区的渗透。在西方孤俄弱俄事态影响下，一方面是俄罗斯再度开始深耕对中亚外交，另一方面是中亚各国对俄罗斯态度的微妙变化，都使局势更加复杂化。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大环境，中亚五国有着强烈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愿望，我国也希望有安全稳定、繁荣富强的西部邻国。显然，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方面，我国与中亚五国一直相向而行。在携手共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战略框架下，双方在“数字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和“绿色丝绸之路”合作中蕴藏着充沛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活力。

（一）高层战略引领，打造区域教育高地

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政治互信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产能和经贸合作屡创新高。双方高层对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战略引领作用日益凸显。2021-2022连续两年的“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都对深化双方教育交流与合作、加强留学生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达成了共识。并且，“中国+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机制也即将启动，这意味着双方间的合作机制进一步提质升级，无疑也将对教育交流合作发挥更积极的战略引领作用。

面对新的时代挑战与机遇，我们应以高层战略引领为基点，促进中国与中亚五国在教育理念与价值层面的相互包容与合和共生，增强交流与合作政策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提升区域人才培养层次、规模、质量与双方经贸产能

合作的适配度,加强教育领域的双边或多边科研合作,探索双边多边合作的新模式、新路径,共同提升区域教育空间的发展潜能与国际吸引力。

(二)按国别对接发展战略,协作培养区域紧缺人才

近年来,中亚五国都陆续推出了新的国家发展战略,如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乌兹别克斯坦“新乌兹别克斯坦规划”、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土库曼斯坦“复兴古丝绸之路”战略等。中亚五国也都积极促进本国国家发展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

国家层面的战略对接需要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作应在研究双方国家层面战略导向的基础上,制定出更为细化的对接策略与中长期合作规划。在推进学科建设合作方面,需要瞄准双方的重点领域和优势学科,选好契合点;注重开发具有地区或国家特色及竞争优势的学科与专业课程,协同制定专业培养规格与教育标准;加强区域内教育质量评估保障体系开发与建设。在确定人才培养的类型方面,需要强化“外语+专业”或“专业+外语”类优质师资培养;继续以设立联合奖学金或专项奖学金等形式共同培育区域内急需的硕博高级专业人才,提升联合培养项目的层次与质量。在深化职业教育合作方面,应研判“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智能丝绸之路”建设框架下新的职业增长点,为双边深化合作精准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加快“鲁班工坊”共建工作,探索职业教育理念、专业课程设置与教育标准开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等等。

(三)协同推进双边教育交流合作与区域教育一体化

中亚五国内部差异性较大,多边层面政策整合难度较大。目前,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主要集中在双边层面。上海合作组织是较成熟的区域教育多边合作架构,但在教育项目的实施层面也主要以双边模式为主,多边层面的标准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还有待进

一步完善。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中亚五国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在提升地区安全稳定与国际地位等方面有着共同的诉求。在受到逆全球化思潮及“三股势力”等因素冲击的当下,中亚国家开始重视区域内多边机制的建设。2018年,中亚五国时隔多年举行了元首峰会。继2020年开启“中国+中亚五国”外交部部长会晤机制后,2022年我国与中亚五国又达成建立元首会晤机制的共识。2022年7月,中亚五国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中亚国家领导人会晤。五国重启区域层面的多边协商模式是中亚地区教育一体化空间建设的积极因素。借此,我国应创新与中亚五国教育交流合作模式,既要发挥双边层面教育交流合作的辐射与带动作用,也应加强多边层面教育合作机制和项目的开发,进一步推进中亚教育空间内相关教育标准和规范的一体化建设,形成教育领域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赢格局。

(四)强化教育研究与宣传,提升中国教育品牌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30年来,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积累了一定的基础。盖因目前该地区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并正经历着的深刻而急剧的变化,中亚五国的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都处于积极调整过程之中。此时,我国更应加强对中亚五国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的研究,力求对其发展趋势精准研判,理性选择双边和多边层面教育交流合作的契合点。既要讲求增强教育交流合作的实效,更要注重提升中国教育品牌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我国自有的媒体渠道是加强中国教育品牌国际宣传和推广的主阵地。此外,我国应进一步注重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合作,利用国际组织的媒体资源加强对我国在中亚地区开展国际教育援助和教育发展合作的宣传力度,维护和巩固我国在中亚人民心目中的正面形象,推动中国教育经验与智慧的国际传播。

(五)创新语言文化传播策略,增强汉语与文化传播的可持续性

中亚地区是民族主义、西方民主主义、泛突

厥主义和俄罗斯文化等多种文化意识形态交织的地区,但在这个相对开放的区域,我国的语言文化推广却遭遇了各种困难。这既与我国和中亚地区长期的隔绝和历史形成的刻板印象相关,也与欧美媒体的抹黑诋毁相关。同时,因为人口基数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原因,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作在规模上确实存在不对等现象,容易给对方造成我国“强势文化输出”的错觉和压力。

因此,极有必要调整我国在中亚地区的语言文化传播策略,在精准掌握对方对我国语言文化需求基础上,按需施教,避免因罔顾对方需求的过度输出而造成的我国“强势文化”输出之误解。此外,还应在加强汉语和文化传播的同时,支持中亚五国加强其国语在我国的教学与应用,化解对方关于我国文化教育单方面输出的担忧。再者,应注重双边或多边层面对语言文化教育的合作研究,加强师资培养的在地化,吸引当地教师参与汉语教材本土化建设,以帮助其提升汉语教学研究能力、缓解本土化汉语教材不足问题。

同时,我国还应弱化政府的直接参与力度,充分调动中亚地区华人及华侨团体、留学生、中资企业、民间团体、社会组织等主体参与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积极性,“润物细无声”地缓解对方的输入性压迫感。2020年6月,孔子学院改由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运作,开启了民间基金会运营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淡化国际中文教育传播的官方背景,提升发展的可持续和高品质。

最后,应充分利用我国在互联网和AI领域的技术优势,探索“互联网+教育”的语言人才培养模式,将先进的教育技术引入教育合作领域,既突出传统文化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充分展示我国现代技术对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引领作用。

(六) 注重中亚青年人才培养,完善青年人才交流机制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近年来,我国日益重视推进中亚青年人才的培养工作。继2021年“中国+中亚五国”第二次外长会晤承诺未来三

年在中亚增加450个奖学金名额后^[33],我国在2022年1月中国-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上,又宣布5年内再提供1200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34]

在致力于进一步提升中亚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层次和质量的同时,我们也应从政策层面积极鼓励我国学子赴中亚地区学习,将中国文化和理念主动传播到中亚各国。此外,我们还应探索双方中小学合作办学项目的可行性,加强大中小学生的短期游学项目建设,培养青少年对中华文明的亲近感,增加其未来将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的概率。再者,应充分利用年轻学子对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偏爱,推动空中课堂建设,构建教育与文化交流虚拟社区,增加中亚青年学子以现代科技方式了解和感受我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发展成就的机会,增强其对我国的情感共鸣。

综上所述,30年来,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作在肩负重要时代使命的探索中持续推进。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双方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法律基础与保障日益夯实、机制和渠道逐步拓展,交流合作基本形成了覆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各层次的格局,实效明显。但如果把我国与中亚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放到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总体坐标系中检视,则双方间交流合作的规模与质量还有很大进步空间,现有的广度和深度与双方的政治互信和经贸合作水平亦不相适应。而且,俄乌战争、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也给双方的合作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挑战与机遇并存。我国与中亚五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着后发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压力和国内发展需求。中亚五国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及我国,但因苏联时期的教育积累,其各自的教育发展水平均相对较高。在我国教育现代化改革亦取得历史性成就的背景下,双方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拥有广阔发展空间。加之2023年将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可以确信,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在“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关系框架下,我国与中亚五国的教育交流合作能够破除各种壁垒和阻碍,继续开创

合作共赢的发展新局面。

参考文献：

- [1] 王振权, 刘闽, 薛山红. 跨越与挑战: 中亚五国教育发展及改革走向 [J]. 外国教育研究, 2006 (12): 31-35.
- [2] Расходы на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выше, чем в Европе. Но качество низкое [EB/OL]. (2021-11-05) [2022-09-25]. <https://economist.kg/novosti/ekonomika/2021/11/05/rashody-na-obrazovanie-v-kyrgyzstane-vyshe-chem-v-evrope-no-kachestvo-nizkoe/?ysclid=l8h4upb97t565693032>.
- [3] Качествен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 это локомотив развит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EB/OL]. (2022-01-27) [2022-09-25]. <https://uzdaily.uz/ru/post/66792>.
- [4] 阿依提拉·阿布都热依木. 吉尔吉斯斯坦高等教育变革研究 [J]. 比较教育研究, 2016 (4): 30-37.
- [5] 肖贵纯. 土库曼斯坦国民教育发展沿革及相关问题探析 [J]. 比较教育研究, 2021 (7): 47-55.
- [6] 李郁瑜. 乌兹别克斯坦国民教育改革及发展现状分析 [J]. 比较教育研究, 2020 (7): 35-42.
- [7] 王雪梅, 海力古丽·尼牙孜. 哈萨克斯坦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 [J]. 比较教育研究, 2016 (8): 7-16.
- [8] С.Н. Мирошников. Проблем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истем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еспублике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В 2000–2020 гг. [J].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21(465):116–123.
- [9] 中国与中亚: 谱写经贸合作新篇章 [EB/OL]. (2022-03-17) [2022-08-26]. http://www.rmhb.com.cn/zt/ydy/202203/20220317_800279791.html.
- [10] Ройшен Мак Кейб. Филипп Руффио, Киара Тибери. Основны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программы темпус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1994 - 2013 [EB/OL]. (2022-09-27) [2022-09-27]. http://publications.europa.eu/resource/cellar/ac6ecbab-0775-4a79-96a4-576f19c53dbc.0001.03/DOC_2.
- [11] Систем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е [EB/OL]. (2016-08-10) [2022-09-28]. <https://ria-stk.ru/news/detail.php?ID=104369&ysclid=l8s45tpes7867561907>.
- [12] 全球孔院 [EB/OL]. (2022-09-09). [2022-09-09]. <http://www.ci.cn/#/site/GlobalConfucius/?key=0>.
- [13] Казахстан и Китай наращивают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фер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науки [J]. (2018-07-18) [2022-10-19]. https://www.inform.kz/ru/kazakhstan-i-kitay-naraschivayut-sotrudnichestvo-v-sfere-obrazovaniya-i-nauki_a3324011?ysclid=l9fkq7gsw4630956762.
- [14] [27] [31] 鲍东明, 曾晓洁, 张瑞芳. “一带一路”建设核心区对外开展教育交流合作情况调研报告 [J]. 比较教育研究, 2016 (12): 8-15.
- [15] Китайско-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EB/OL]. (2019-12-02) [2022-09-29]. https://chinastudies.kz/ru/publications/kazakhstan_and_china/338/.
- [16] О состоян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итаистик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имер Казахстана [EB/OL]. (2020-02-20) [2022-10-20]. <https://www.caa-network.org/archives/19261>.
- [17] Факультеты и кафедры [EB/OL]. (2022-09-26). [2022-09-26]. <https://tsuos.uz/ru/fakultetlar-va-kafedralar/>.
- [18] Г. Р. Габриелян. Влияние политики «мягкой силы»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роли КНР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J].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21(1):63–69.
- [19] [22] 胡瑞, 王一涵, 张焱. 西亚和中亚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 概况、挑战及策略 [J]. 世界教育信息, 2022(1): 36-58.
- [20] 阿依提拉·阿布都热依木, 刘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教育合作的政策对接与实践推进 [J]. 比较教育研究, 2019 (12): 22-29.
- [21] Маргарита Бочарова. Много ли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учится за рубежом и почему? [EB/OL]. (2020-06-17) [2022-09-29]. <https://factcheck.kz/claim-checking/verdict/mnogo-li-kazaxstanskix-studentov-uchitsya-za-rubezhom-i-pochemu/?ysclid=l8mdykdid2499570092>.
- [23] Алина Альбекова. Больше 30 тысяч студентов из-за рубежа планируется привлечь в Казахстан [EB/OL]. (2018-04-09) [2022-09-28]. <https://inbusiness.kz/ru/news/bolshe-30-tysyach-studentov-iz-za-rubezha-planiruetsya-privlech-v-kazakhstan>.
- [24] 杨恕. 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教育交流合作的战略思考 [J]. 比较教育研究, 2015(5):5-6.
- [25] 大学简介 [EB/OL]. (2013-03-11) [2022-09-11]. <http://www.usco.edu.cn/info/1068/1359.htm>.
- [26] УШОС: Российские вузы приняли более 200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тудентов по программам УШОС в

- 2018/2019 учебном году[EB/OL](2022-09-11).[2022-09-11].http://uni-sco.ru/news/78/2018_06_30.html/.
- [28] 2018 年来华留学统计 [EB/OL].(2019-04-12)[2022-09-13].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 [29] Елена Новоселова. В выставке-ярмарке в Ташкенте приняли участие 56 российских вузов[EB/OL].(2022-10-11)[2022-10-16]. <https://rg.ru/2022/10/11/ohota-na-abiturienta.html?ysclid=l9bep1pgd0555561922>.
- [30]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выяснили, почему в России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студентов из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EB/OL].(2021-10-18)[2022-10-15]. <https://fergana.media/news/123422/?ysclid=l99fwevst789215120>.
- [32] Н.А.Медушевский, А. Р. Шишкина.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е системы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ызовы, риск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J]. Системный мониторинг глобальных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рисков, 2014 : 324-363.
- [33] “中国 + 中亚五国” 外长西安会晤, 王毅谈八点共识和十项成果 [EB/OL].(2021-05-12)[2022-09-18]. <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366978.html>.
- [34] 共建中国 - 中亚命运共同体 习主席的话引强烈共鸣 [EB/OL].(2022-01-27)[2022-08-26]. http://www.xinhuanet.com/2022-01/27/c_1211545279.htm.

Thirty Years of 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 Review and Foresight

XIAO Su, SHI Yueqi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Central Asia is a region of Asia that stretches from the Caspian Sea in the west to western China, and is regarded as important pivot point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trengthening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enhancing mutual political trust and raising the level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to achieve people-to-people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ve gone through a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rom slow to rapid progress and single to diversified dimension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paths of 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5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been enriched and become increasingly effective. However, due to the complex ethn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nd the changing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Central Asia, the sustainability and pragmatic development of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still face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lack of medium and long-term strategic planning, weak awareness of building China's education brand, and insufficient training of complex talents. Therefore, in order to achieve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it is necessary to think at a higher level, emphasize the alignment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each country, commit to the synergy of regional educational integration, focus on building regional educational highlands, and innovate languag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责任编辑: 曾晓洁